疫情之后，香港可能的另一面

原创 靖海侯 [靖海侯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靖海侯**

微信号 gh\_4dc33fb71939

功能介绍 常言所未言

2020-08-29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5MDY4MzczMQ==&mid=2247483799&idx=1&sn=0597aef2f5d11e53b7d83e2cbfe2a8ce&chksm=fe3bcaabc94c43bdec884ad9bbbe0b355dbd8d68a30e750a4e266d83885b053066d75561f1b4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10)

收录于话题 #时代的沉淀：香港启示录 78个

一

香港被疫情打乱的，不只社会秩序、经济秩序，还有政治秩序。

二

国安法公布施行，正在塑造香港新的局势。反对派大佬纷纷“变脸”，“港独”组织作鸟兽散，反中乱港分子伺机逃窜，暴力示威活动戛然而止。

随着反对派在国安法的巨大震慑力前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“被动驯服”，香港黑暴退潮、动乱收敛，已与修例风波时的风雨飘摇形成鲜明对照。

国安法改变的，还有香港特区政府与建制派。

1.敢于打破“固有坚冰”，开始整顿曾经扮演反对派“喉舌”的港台，全面推动修改香港中小学通识科教材，特区政府的管治方向更清晰，管治行动更坚决；

2.不畏英美威胁与制裁，问责官员表现出昔日罕见的“强硬”姿态，政治态度更鲜明，政治表现更整齐；

3.积极贯彻落实国安法，依法逮捕黎智英及一些反对派立法会议员，突破“传媒不能碰”的执法盲区，为修例风波中一些被反对派“定义”的重大事件（如7.21等）重新定义；

4.爱国爱港者理直气壮，发声、践行更从容勇敢，建制派作为建设派的作用在长期被压抑后开始释放。

正如靖海侯上一篇文章所说，一种力量在崛起，一种力量在撤退，国安法触发的香港局势的链式反应，还在持续发生，并有系统化、立体化、集约型的呈现。

这是香港局势的一面。

三

**是否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，一直决定着香港治理实践的成效与实效**。

这是经验，也是教训。

在国安法公布施行后的大破大立关头，依然需要对香港局势持理性客观态度。

香港局势，还有另一面。

一则，国安法管用；一则，国安法并非万能。

认识这一点，不妨从最近香港发生的新闻事件说起。

1.老板被逮捕和被搜查后的壹传媒某水果报，仍然在日日叫嚣，用词“凶猛度”甚至甚于事发前。2.香港大学学生会在某水果报头版做广告，公然对抗国安法；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出所谓“家书”，对母校“暴大”之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继续美化、力挺黑衣暴徒。二者与其在修例风波中的表现并无二致。3.中央全力助港抗疫，为港人提供免费检测计划，香港反对派乃至一些医护人员还是危言耸听、肆意抹黑。4.香港的“KOL”照旧每天在报章谰言不止、误导视听，香港的舆论生态并没有明显好转。

就在日前，刚被港大解雇的非法“占中”发起人、2016年立法会选举“雷动计划”和2019年区议会选举“风云计划”的炮制者戴耀廷，被两地建制派媒体在国安法出台前后集火抨击的人，再又提出“拉撒路计划”的乱港行动，声称要号召至少4000人讨论香港的未来，以“建设民主香港”。25日，建制派人士到选管会门前提交请愿信，要求跟进反对派“初选”违法事宜，被作为特区政府机构的选管会拒收。

**局势向好，情势犹险，香港今天的现实，仍然埋伏着香港明天的危机。**

四

香港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，香港政治问题的根源是政治生态问题。无论这生态是历史形成的，还是人为构筑的，甚或是群体性的集体迷思所致，但它客观左右了香港的三个基本现实：

1.香港政治光谱的基本面，短时间内不会大变，社会政治基础仍然极不稳固。

2.香港社会的撕裂与内耗，长时间内还会持续，政治价值上的大一统不可能实现，香港这座城市的政治化已成趋势。

3.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重启，或许可以为香港带来一片生机，但如果没有自下而上、普遍意义的政治觉醒，时间越久，香港爆发新的危机的可能性越大。

生态问题自带有顽固性的属性，矫治离不开久久为功。

此前香港频发教育乱象，靖海侯当时即分析其属生态问题，有些观点同样适用于当下：

**孩子是果实，教育是枝叶，社会是主干，经济是根茎；而政治是气候，决定阳光雨露。在一个自由、开放的地方，要改良生态环境，必须由表及里，而不是盯住具体的人群、具体的领域。否则，既治不了表也治不了本，还会引发巨大反作用，让局势升级。**

这番话，其实蕴含着靖海侯相当重要的一个观点：

**香港问题是“极少数人”的问题，更是“大多数人”的问题。**

**“大多数人”的问题，不是指他们与祖国离心离德，而是指他们与祖国若即若离，对国家和特区政府的认同度不高、信心不足，爱恨交织，持暧昧游离态度，拥抱时少了一些坚定，守护时缺了一份勇敢。**

近期，知名香港政治问题专家、香港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，即便是建制派里，也有一些投机者，为生意而站队，因利益而趋附。他认为，不能泛泛地把建制派=爱国者。

其分析，正是问题的另一种折射：复杂、系统，潜存于各种群体和深层次的香港社会，干扰乃至主导着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。

而在今天，在国安法时代，在香港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中，这种“大多数人”的生态问题，正是刷新香港局面的最大不确定性，让根本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变得漫长起来。

五

问题的严重性，不仅于此。

国安法后香港的变化，主要体现在社会运动方面。如：反对派规模性的游行几近断绝，暴力破坏的行动基本消失，包括舆论战中表现出的气焰亦呈现衰弱的景象。

但这一切的“转变”，并非仅仅是国安法所致，另外还有一个因素，客观上“装饰”了香港今天向好的政治现实的表象，那就是：

**疫情。**

修例风波的阶段性结束，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，而全国人大关于香港国安立法的消息出自今年5月底。反对派在1月份作出策略性调整，明显与后者无关，更不可能是反对派的自我觉悟。反对派在暴力暴动上有选择性地“安静”下来，正是因为疫情的爆发。

善以利交和外强中干的反对派，在权衡自己的生命健康与政治活动时，也明白孰轻孰重。而随着特区政府考虑防疫及公共卫生需要，于3月份推出限聚令、严格约束人员聚集后，他们组织别人上街游行的动员能力和实践空间也被大幅削减了。

毕竟，自香港新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上任后，严正执法已成为新常态和现在进行时。

反对派当前要发起社会运动，正面临**双重法律限制**和**双重人身风险**：

可能触犯国安法，可能违反限聚令；

被拘捕的风险，被感染的风险。

**君子不党，小人为群**。乌合之众的一个特点就是：

*“群体中的个人是沙中之沙，风可以随意搅动他们。”*

国安法不是无牙老虎，新冠肺炎也绝非危言耸听。当反对派清楚地认识到，“送人头”的几率越来越大，搞破坏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，他们唯一可能可行的选择就是“蛰伏”。

这种“蛰伏”是策略性且具有欺骗性的，是容易让人错判香港局势的。

香港局势向好，绝不是形势大好。

六

民调数据是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共有武器。

8月28日，香港《文汇报》刊登一则新闻，用香港大学8月27日的最新研究成果，证明港青惨遭反对派洗脑的事实。文中引述：

*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团队，于本年1月至4月期间，透过社交媒体、中学、大学、社区网络等招募712名15岁至25岁青少年，了解他们历经黑暴动荡后的政治参与取态及心理健康。结果显示，过去半年约九成人有参加政治活动，以低风险为主，各有约七成人曾经讨论政治议题、签请愿信、参加游行集会等。***倾向同意“违法和暴力”及“合法和非暴力”行动、被称为“和勇派”的有35.5%，而同意“违法和暴力”并反对“合法和非暴力”的“激进派”，则占8.8%。**

《文汇报》的分析与评价不无道理，这些数据，呈现着一种可怕的现实：香港不少青少年的政治取向与未来可能的政治走向，充满了危险的引信。

这是《文汇报》似已认可的调查数据，如果用香港中间派媒体或极右媒体媒体的调查数据，情况或许更糟糕。

国安法出台后，在反对派和反对派媒体的攻击抹黑下，不能否认香港不少人是有忧虑的，而忧虑的主要原因除了外在的信息干扰和扭曲，更在于他们不少人已在修例风波中犯下“原罪”。虽然国安法明确“不溯及既往”，但这些“原罪”足以让他们背上沉重的包袱，并产生对国安法莫名的长期的抗拒。

更重要的是，其政治取向与昔日的政治行动，都为被塑造成型的“三观”所驱动，有深沉的心理成因，一时难以改变。

这，就是香港社会政治基础的现状与特点。

香港著名传媒人屈颖妍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为什么我们活得像地下党》。在文中，她痛心地指出：

*“明明理亏的是他们，明明已是执政者，但我们却活得像地下党一样。人家黑丝带、猪胸章、蛙背包……通通光明正大拿出来，我们也有很多撑警纪念品，但大家只敢放在家收藏观赏。”*

同港大的研究发现一样，说明了同样一个事实。

而当疫情过后，这种现实、这个事实或许又要浮现出来。

七

香港社会有游行示威的“文化”。

根据香港警卫处的统计数据，自2016年以来，香港“公众活动”（游行+集会）每年均超过1.1万次。

靖海侯在香港多年，早已见惯香港此类活动如家常便饭，考虑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和游行，警方的统计数字极有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。

问题是，这种“文化”是突然消失吗？

不会。

1.香港人的游行示威，是一种政治活动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；2.香港的反对派需要怂恿游行示威催生、聚拢反对运动的人气；3.香港社会的重大政治、法律争议不断，政治议题层出不穷；4.无论是民意战、舆论战还是法律战，都需要公众的参与和推动；5.在香港，青少年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方面，而他们还很年轻，还有时间。

当疫情过去，限聚令取消，反对派吃透“国安法”后发现或有的“灰色地带”，他们一定会发起新的组织动员，让游行示威“卷土重来”。

对一个强调所谓“民意赋权”和“认受性”的地区来说，游行示威就是最好的宣战平台，彰显社会心理，塑造社会认知，制造社会冲突。

疫情后的香港，会有另一面。

八

国安法公布施行，标志着香港迈入了新时代。新时代，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，也将是管治香港的新常态。

国安法后的香港，不会一劳永逸。重大挑战、重大风险、重大阻力、重大矛盾，不仅不会自然消失，还可能更多。幻想香港反对派变成“忠诚的反对派”，幻想通过修改一本“通识教育”教材就能重新塑造香港青少年的“三观”，不靠谱、不现实。

修例风波“浪高风急”的时刻已过，国安法时代“暗流涌动”的情势未改，治理香港这座城市，最需要冷静理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。最主要的是：

**放弃政治上幼稚的“决战思维”，继续爬坡过坎，深耕细作，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心。**

靖海侯

**微信扫一扫赞赏作者** **赞赏**

已喜欢，对作者说句悄悄话

取消

**发送给作者**

**发送**

最多40字，当前共字

 人赞赏

上一页 1/3 下一页

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

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，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，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。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